

新生活與婦女解放

陳衡哲



新 生 活 叢 書

新 生 活 與 婦 女 解 放

陳 衡 哲 著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新生活叢書發刊旨趣

革命以後，中國社會在表面上似已有顯著的進步，但實際上沉滯在社會底層的一切惡風舊習，仍沒有絲毫的動搖。

我們企圖推行新政，復興民族，最根本最迫切的要點，不可不使中國人的生活態度，徹底的改善。像大多數中國人生活的散漫，頹唐，頑固，決不能接受近代科學的文化的。決不能使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具體地實現的。

現在蔣先生在南昌行營以身作則，積極提倡新生活運動，的確是救中國救民族的良劑——起死回生的良劑。中國民族能不能從根救起，就在此一舉了。

中國是世界上最富於歷史性的國家，在不與列強接觸的時候，中國即憑恃着祖宗所留給我們的遺產，已足夠享受了；可是，到此刻列強均在殫心竭慮求科學的進步，使一切文化，生活，咸受科學的洗禮，而我們還是墨守成規，誇耀祖宗的遺產而自豪，從不進求「推陳出新」的方法，是萬萬不能存在的。遲早歸於滅亡的。所以，這負有重大意義的新生活運動，雖然是蔣先生所首先發起，而實在是時代自然發生的需要。生活的改造運動，可是說中國一切文化推進的原動力。

我們發行這叢書的目的，是在使新生活運動取得學術上的根據，根據學術的精神，發揮新生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，俾中國人一般的生活，求得合理化，科學化，藝術化，革命化，現代化。

同時，在古今中外的名人中，搜求其歷史，事實，分析其時代背景，敘述其奮鬥的過程，成功的途徑，以及其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功效，作我們自立立人的模楷。

而後再就現代的各種職業的內容，從經驗上性質上研究其特點，講述各種業務員應該具備底條件，說明各種業務員分內應做的事，分外可做的事，以及對社會國家無可逃避的責任，使一切生活習慣，均不背於新生活的精神和原則，作我們生活的標準。

現在新生活運動的高潮，已經普及全國。但如何實踐新生活？如何發揚新生活？如何使新生活運動影響到大眾的舊生活？像這樣的切實具體的計劃，大家還在焦灼地期待着。所以，本叢書的發行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。我們深信本叢書所包括的內容，一定能滿足大家的需要的。

著者啟事

國內人士如欲引用本書之內容，著者當然同意，但須遵守下列條件：

- (一) 引用本書時，須將出處申明。
- (二) 引用本書某段某句時，所引者均須意義完全而自成一段落，請勿斷章取義。

新生活與婦女解放

本書所討論的，既不是新生活運動的本身，也不是婦女解放問題的本身，也不是空泛的所謂婦女運動，乃是新生活與婦女解放的關係。

初看上去，新生活與婦女的解放，似乎是兩個滿不相干的題目，不，似乎是兩件含有衝突分子的事情。但我們若肯仔細的想一想，便知道這種觀念是不但膚淺，而且是不合於理論和常識的。我之所以選擇婦女解放的一個題目，作為討論新生活的依據者，即是想用積極的理由，來證明這個觀念的錯誤。再說明白一點，我是想靠了這個題目

的討論，使國內有識的婦女們與男子們，能更明瞭解放了的婦女在新生活運動中的重要，因此證明這兩件事是不但不必衝突，並且在優良的環境與指導之下，在一個能夠實行新生活而又是解放了的婦女的手中，牠們還可以成爲一個相需相成的互惠結合。

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，我們應該先注意下列的幾點：（一）什麼叫做新生活？（二）牠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所占的是什麼地位？（三）什麼叫做婦女的解放？（四）牠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所占的是什麼地位？明白了這四層，我們然後可以討論新生活與婦女解放的關係。

對於新生活的意義，黨國的領袖如蔣介石先生等，似乎都已說得

很明白，用不着我再來添什麼蛇足了。但最能作爲新生活的定義的，則又莫過於下面所引蔣先生所說的話：『教育始於灑掃應對，而終於立身行道。這灑掃應對就是今日之所謂食衣住行。立身行道就是今日之所謂禮義廉恥。』所以假若一個人對於這個條件，但能做到下半節，那麼，他便不免要犯好高騖遠的毛病。比如他但知道高談禮義廉恥，而他個人的生活，卻是十分的不規則，十分的不健全，甚至於十分的虛偽，那麼，他的所謂新生活，也無非是一紙空談罷了。假如他但能做到上半節，而忽略了新生活的基本，那他又不免犯了『舍本逐末』的毛病。故他雖然知道扣好鈕子，戴正帽子，『早晨相見說『你早』，相別之時說『再見』』，而卻又絕對不了解人生的意義和牠的

高尚的目標，那末，這種種幼稚園式的訓練，對於一個民族的前途，豈不等於大海上的有一點微波，還有什麼真實的力量呢？故新生活的意義，必須廣狹兼及，表裏同視，方能有收獲實效的一日，方能不犯空談與逐末的毛病。

我們要說明的第二點，是新生活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占的地位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可用『多難興邦』的一句話，作為牠的鑰匙。因為近年來我們所受到的內憂與外患，在促成中華民族的自覺與自省上，牠們的效力比了任何教育的工作還要廣大。我們因此更能明白，多難之所以能幫助一個邦國的復興，不單單靠了外表，更須能振盪到一個民族的內心，方能發生牠的良藥的功效。

具體的說來，當一個民族受到外患的侵凌之後，牠的第一步的覺悟，是兵將不如人，戰器不如人，戰法不如人。於是牠的第一件工作，也便集中在武備學堂和兵工廠之上。慢慢的，經過了又一度的外患與侮辱，這個民族眼看着戰艦的沉毀，兵士的潰散，堅甲利器的百無一用，便又漸漸的感到武力的不夠，漸漸的覺悟到政治與政體的更爲根本，更須改良。於是牠的第二步的覺悟，便是政治的改進，甚至於政體的改革。但是，仍舊不行。人家的機器——無論是共和政體與民主政治也好，是獨裁式也好——是那樣的圓轉自如，而我們的機器卻是那樣的推轉不靈。這民族又想了，想着想着，牠忽然拍案大叫，說，『有了，人家機器那樣的靈，豈不全靠着那些製造與運用機械的

專家！他們開礦，打鐵，製型，配件，開機，上油，那一樣不曾經過深刻的研究，那一件事沒有牠的專家？我們若要學他們，非得從研究學問與製造專家下手不可。』於是這民族便把牠的青年，派遣到世界各國去，把牠們智識上的精華都採了回來。這些青年回來之後，專門學問是有了，機器是懂得開了，但是，仍舊不行。人家的機器，是開得那樣的快慢合度，動止自如，而我們的卻是那樣的橫衝直撞，毀着田禾，傷着人畜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那民族又縐着眉頭，想着想着，想到後來，牠可真正的覺悟了，牠說，『這毛病準管在那些青年們的心眼裏呀！』

這雖有點像寓言，其實一點也不是我的杜撰，不信，有歷史作

證。當我們在十九世紀中葉，見敗於英法之後，我們的覺悟，是合乎上面的第一步的。故武備學校與兵工廠的建立，也都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。我們的第二步的覺悟，是在中日戰爭之後，故戊戌政變與革命運動，都在十九世紀的末年與二十世紀的初年。後來共和成立，我們又感到專門人才的需要，故民國以後派遣到歐美各國的留學生，不但在數量上比前加增，即在學科方面，也由政治速成科之類而變為對於西方文化的研究，及對於各種基本學術——如各種科學和哲學文學之類——的精深的探討了。因此，在近十餘年來，國內專門學者的加增，真可謂空前未有。并且這個加增並不限於自外洋回來的，國內自己所供給的，也是一天多於一天。不意機械師儘管加增，機器卻仍舊不

靈。於是中華民族的代表，各位黨國領袖們，便看出這毛病來了，他們說，『這毛病準管還在大家的心眼裏呀！』所謂新生活的運動，不正是對此症所下的藥嗎？這是我們民族自覺的第四步，也是最根本的一步。這便是新生活運動的歷史意義，也便是牠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所占的地位。

提倡新生活運動的黨國領袖們，似乎也已見到這一層，故他們並不主張恢復一切的舊禮教與舊制度，而但注重到人生根本的禮義廉恥上。他們也不提倡倣效歐美人的一切生活，而但令我們去學他們的守秩序，愛清潔，重團體，負責任，及其他的基本道德。要不然，假使我們無條件的去提倡舊禮教，則捫蝨而談，披襟當風等的粗醜行爲，

儘不妨稱爲名士風度；而一家之中，妹妹守童貞，哥哥吃花酒，也都可稱爲精神文明了。反過來說，假使我們但知提倡歐美的生活方程，則向右轉的人，便該將他的生活宗教化，而婦女們也就應該戴着紅箍帽子到十字路口去宣傳福音。向左轉的人，又應該把他的生活性慾化和好萊塢化，而婦女們也就應該把畫眼塗甲和裸體跳舞，作爲她們對於人類所負的唯一責任。在這個左邊大海，右邊妖怪的道途上，提倡新生活的領袖們，能不偏重所謂舊道德或是新潮流，而但曰某者當爲，某者不當爲，把新生活作爲一種合理化與藝術化的，自尊與自助的生活情形，在無形之中消弭了許多未來的誤解與流弊，這真是所謂能見其大了。

我們應該注意的第三點，是婦女解放的意義。有些人聽到婦女解放便頭痛，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曾經因此吃了苦。但他們不知道，使他們吃苦的，並不是真正解放了的婦女，乃是但知浪漫與放縱的自私女子；而他們又不能明白，放縱與解放，乃是所謂『失之毫釐差之千里』的兩件事。解放是一件自內向外的行爲，是婦女人格與才能的發見與恢復。最近我在某報上，論及婦女問題時，曾有過這樣的一段，現在不妨把牠抄下來，作爲我對於婦女解放的定義。

不過婦女解放的進行，豈能永遠順着那剪綵繩與做校花的一條路？婦女解放的真諦，也豈是把一個廚役式的老婆，變爲一個舞伴式的『甜心』？假使女子的解放，只在模仿男子的弱點，那

麼，一個沉湎於跳舞與放浪的女子，不就是我們新時代女子的模範嗎？所以我說，女子解放的真諦，在志願的吃苦而不在淺薄的享樂，在給予而不在受取，在自我的上進而不在他人的優待。簡單說來，即是在心理與人格方面，而不在形式方面。故一個真正解放了的女子，必是受過相當教育，明瞭世界大勢，有充分的常識，獨立的能力，與自尊的人格。在不曾解放的女子中，不但儘有受過教育的，並且多才多藝的也未嘗沒有。但她們與新婦女比起來，卻有幾點根本上的不同：其一，是她們的依賴的人生觀，其二，是她們對於新時代常識的缺乏，其三，是她們在智識技能上的缺少擅長。